

# 中国政治学在回应时代中创新发展

浦兴祖

对国家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探究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知识与理论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对政治的理解和阐释。不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不断创新,积累了丰硕成果,为我国国家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科也不断发展。从学术研究看,学者们积极关注火热的改革开放实践,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产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引入西方政治学成果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开始建构具有自主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日渐成熟。

新,并力图将其中反映人类政治生活规律的内容上升为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形成兼具本土性与国际性的中国政治学。

**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凝结着中国传统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影响了中国政治演进历程。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合思想、天下为公情怀等,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求科学准确研究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提供文化滋养。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相协调。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中国政治学应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并注重二者的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基础研究偏重于学理层面,主要围绕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展开,丰富发展政治学、完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基。应用研究则针对政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展开,旨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基础研究越扎实,越能为应用研究提供学术根基和理论支持。而应用研究在贴近现实政治、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不断从政治实践中汲取营养,为深化基础研究提供实证参考和经验总结。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规范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定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经验研究注重实证调查、定量分析和事实判断。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者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动因、逻辑,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价值;后者描述政治运行的状态、过程,分析政治运行的成效、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既需要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规范研究,也需要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层政治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根据不同研究领域的特点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而发挥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比如,基础研究更侧重规范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更多运用经验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注重将各种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

## 把握重要关系

### 逐渐探索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作为指导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政治学系,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后来,有的政治学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研究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在这一阶段,新中国的政治学获得一定积累。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底,以老一代政治学者为骨干,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在此前后,部分省市也组建了地方政治学会。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率先重建政治学专业,各地高校纷纷跟进。与政治学相关的一批教材、专著和译著相继问世。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政治学研究所并创刊《政治学研究》。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培养出多届政治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至此,政治学的人才、机构、期刊、教材等要素基本具备,开启了全面发展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治学发展提速增效,取得显著成就。从人才培养看,形成多层次、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从学科建设看,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获得公认,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政治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学

**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我们从西方译介了大量政治学论著,这是必要的。西方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规律进行了一些探索,对我们开展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学理论只是反映了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政治生活的规律,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政治学扎根中国土壤,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

## 继续深入耕耘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政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要求加快完善。70年来,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从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来说,还存在不小差距。中国政治学要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特别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

今天,经验研究方法越来越受重视,一批政治学研究者深入机关、社区、农村,展开卓有成效的应用研究。这值得充分肯定。相对于应用研究领域的“热闹”场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却显得有些“冷清”。基础研究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是理论创新的支点。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是中国政治学迈上新台阶、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关键。

事实上,在政治学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回答,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生长点。比如,关于政治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政治是与国家公权力运用相关的现象。但这只是对政治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政治现象受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经济、文化、社会等会影响国家权力运行。反过来,国家权力的运行也会对其他社会因素产生影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政治运行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对政治形态进行一般规律性研究,能够增强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再如,关于国家治理的主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是包括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这样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汇聚更广泛的力量。今后,我们应努力在观察实践的基础上深化学术思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更加深入、学术境界不断提升。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 为政治文明发展提供滋养

曹德本

从中国古代延伸到近代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是已经发生的思想进程。但它并没有因为历史过程完结而消散,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实并塑造着未来。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受到学者们关注,那就是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吸收传统政治思想的有益成分,为政治文明发展提供借鉴。

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需要从文化的视角深入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一是怎样阐发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和谐,以和谐为纽带,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以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这种和谐文化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如何看待齐治平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融汇各家思想而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它从哲学高度探索天人合一,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同时又关注现实,注重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文化特点在历史上对国家和个人都有着重要影响,也必然体现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中。三是怎样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诸多积极的思想观念。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倡导惠民利民、安民富民,这对中国传统政治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应探讨这些积极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并思考如何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努力为社会、民主、法治建设提供文化滋养,推出很多卓有建树的成果,开创了研究新局面。新时代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要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学术创新,与时俱进,推动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学术创新往往以学术观念创新为先导。学术观念创新主要包括学术责任的明确、思维范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

学术责任是指一个学科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学术使命以及学者应具备的责任意识。新时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应从学理上更充分、更深入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挖掘,推动传统政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积极参与世界多样文化的交流互鉴,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支撑。

思维范式关系到研究方向和研究水平。近代以来,怎样处理中国传统政治史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也有人主张全面恢复传统。这些偏颇的观点当然受到了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也暴露出一些人在思维范式上的局限,即用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来看待复杂文化现象。这种思维范式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依然存在。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我们应及时转变思维范式,从多样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推进研究。

思维范式的转变能够带来研究视野的拓展。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既要善于从世界看中国,也要善于从中国看世界。在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时,要善于结合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明辨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要坚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清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在关注他人长处的同时认清自身优势。要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出发点进行评价和取舍,得出令人信服结论,更好地将研究推向深入。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文化薪火传递工程,而绝非急功近利之学。研究者应追求做扎实学问与担时代责任相统一,潜心耕耘,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更好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养料。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立足新实践 关注新议题

# 将外交学研究推向深入

刘兴华

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加强对外交中中国角色、中国路径、中国经验等方面的研究,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议题,努力为我国深入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作出更多学术贡献。

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外交学研究中各种新兴问题不断涌现。除了已被深入探讨的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以及经济外交、环境外交、文化外交等,还有一些前沿问题也值得关注,以更好推动学科向纵深发展。

**研究组织化外交实践。**当今世界,外交呈现多种形式,特别是在多边外交领域,组织化特征比较明显。多年来,中国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内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推动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一些组织化特征突出的外交活动和现象,应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决策程序、规则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问题,为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体系中的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研究区域外交相关问题。**区域关系处在双边关系和全球关系两个层次中间,主要以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为主体。区域外交在当今世界非常活跃。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就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持续、创新、包容增长的平台,自成立以来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与区域合作进程。亚洲是中国发展的地区依托,区域内面临着复杂局面,各种新老问题交织。习近平主席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对于实现亚洲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中国外交学应加强对亚洲新安全观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阐释,着力思考如何加强地区互信、团结和认同。

**关注民间外交。**当今时代,除了国家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外交活动,民间外交机制在加强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学应研究民间外交在推动世界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国家政策规划的方式等,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对外交谈判进行综合研究。**外交谈判是外交领域经常发生的现象。如今的外交谈判日益呈现复杂特征,需要拓展对外交谈判的综合研究。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不同国家的国内状况,也会影响外交谈判。中国外交学需要对影

响外交谈判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分析。还应充分掌握并细致研究以往谈判案例,并致力于培养更多高素质谈判人才。

**关注数字外交和智能外交。**除了国家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外交活动,民间外交机制在加强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学应研究民间外交在推动世界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国家政策规划的方式等,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 学苑论衡

XUE YUAN LUN HENG

外交学是一门探究外交思想、制度、行为和政策的学科。外交学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的外交实践都是外交学关注的对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开展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外交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外交学研究不断拓展新视野。在新时代,外交学研究应立

## 信息快速

# 为营商环境法治化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营商环境法治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述要

吴至诚

中国人民大学营商环境法治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营商环境法治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单位协办。

与会学者指出,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竞争力。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相关学者应加强对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历史、现状与趋势的研究,为正确处理市场与法治的关系提供学理支撑。在研究中可以更多关注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新实践、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中的法治因素、营商环境法治建设的现实途径等。通过研究,以标准化、可验证的方式,提炼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有益理念和实践经验,助力各地区、各行业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营商法治体系。